

文化史料

WENHUA SHI LIAO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0.3

K250.3

1

2:6

文化史料

丛刊

第六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資料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B055573

文 化 史 料

(丛 刊)

第 六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营

1983年6月第1版·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frac{1}{32}$ 印张: 6 $\frac{1}{16}$ 字数150,000

印数: 1—10,000册 定价: 0.84元

统一书号: 11224·119

《文化史料》丛刊编辑者

(按姓氏笔划顺序)

马彦祥 孔罗荪 刘开渠 吕长赋
沈从文 吴作人 吴世昌 张毕来
张西洛 张世龄 胡风轮 周士观
贺捷生 黄药眠

本辑部分作者简介

- 张楚琨** 全国侨联副秘书长，郁达夫在南洋流亡时的难友。
- 金 丁**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郁达夫在南洋流亡时的难友。
- 郁 风** 著名画家，郁达夫的侄女。
- 于 听** 即郁天民，郁达夫的长子。
- 陈叔通** 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前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
- 徐伯昕** 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三联书店成立时负责人之一。
- 廖辅叔**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 曹 禺** 著名剧作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 黄宗江** 著名电影导演。
- 黄药眠**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 袁世海** 中国京剧院副院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1926年郁
达夫(中)与
创造社同人
郭沫若(左)、
成仿吾(右)
摄于广州



1982年5月何丽有(前排中)回内地探亲时与大女儿郁美
兰(后排左二)、儿子郁云(前排右一)合影



香港三联书店分店(1974年)



1948年三联书店在香港成立时的三位负责人
自左至右：沈静芷、黄洛峰、徐伯昕



黄自像



1933年黄自(右二)在上海国立音专与萧友梅(中)喻宜萱(左二)、李惟宁(左一,美国名作曲家齐而品的夫人)合影



袁世海（中立者）17岁时
与齐如山（中坐者）、阎世
善（后右立者）、毛世来
（后左立者）合影



袁世海与李世芳合演
《霸王别姬》



袁世海（中）17岁时与李世芳（左）、刘元彤（右）合影

目 录

忆流亡中的郁达夫·····	张楚琨(1)
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补遗·····	金 丁(25)
在最后的日子里·····	郁 风(39)
访郁达夫在香港的遗孀何丽有·····	马 力(41)
郁达夫生平事略(上)·····	于 听(49)
回忆商务印书馆·····	陈叔通(81)
在艰苦战斗中建立的团结——纪念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致力革命出版事业五十年·····	徐伯昕(91)
千古文章未尽才——我所认识的黄自·····	廖辅叔(105)
附录：抗敌歌	
岭南革新派画家陈树人和高剑父·····	黎葛民 麦汉永(133)
回忆在天津开始的戏剧生活·····	曹 禺(157)
南开剧话拾遗·····	黄宗江(162)
往事追忆——上海租界捕房的狱卒对我的“训诫”·····	黄药眠(165)
落花生的品格——许地山先生生平散记·····	熊寒江(171)
五十年曲艺生活的回忆·····	张寿臣(176)
相声的起源·····	张寿臣(185)
我的舞台生活(五)——七年坐科生活(续完)·····	袁世海(189)

忆流亡中的郁达夫

张 楚 琨

我和郁达夫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南太平洋侵略战争期间，一道工作，一道流亡，瞬息四十年了。他离开我们也三十七年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轰炸新加坡，在马来亚哥打峇鲁登陆。当时，我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编辑兼《南洋商报晚报》评论员；郁达夫在《星洲日报》主编《晨星》等三个副刊兼主编新加坡英政府公共联络部（俗称情报部）办的《华侨周刊》。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中心的新加坡，这时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敌保卫星马的群众热潮。文化界同仁在胡愈之的领导下，为负起对广大群众开展精神动员的责任，决定成立星洲（新加坡简称）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参加者有新闻界、教育界、书业界、文化界、音乐界、美术界代表，包括南来的知名人士郁达夫、王叔暘、沈兹九、王纪元、张企程、杨骚等。一个五人常务委员会选出来了，即胡愈之、郁达夫、庄奎章、王叔暘和张楚琨。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张楚琨任组织部长，王叔暘任宣传部长，庄奎章任训练部长。

文化界先走一步，接着全星华侨各界成立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主席陈嘉庚，下辖劳工服务团、保卫团、民众武装部。胡愈之被选为执行委员兼宣传主任，郁达夫为执行委员。

在这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郁达夫天天见面。一起开会，一起对群众演讲，一起慰问星华抗日义勇军。这位发表《毁家诗纪》的诗人团长，不是挂名，而是真干，热情洋溢地负起领导责任来。

当时战时工作团搞得热火朝天，主要是搞两项工作：一项是成立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在炮火中训练青年干部，准备担任民众武装的政训工作；另一项是组织口头宣传队、流动戏剧队、歌咏队，到街头去，到工厂去，到码头去，到防空壕去，到群众密集的地方去进行抗敌宣传。

我记得，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作朝会讲话（他兼青训班大队长）。敌人轰炸加剧了，第二期青训班一百多人不得不分为四个中队，散布在金炎律南侨师范学校、后港、梧槽大伯公和爱同学校四个地方；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不畏缩。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战局越来越严重，英军节节败退，热血沸腾的新加坡华侨青年，由刚释放出来的政治犯（绝大多数是马共党员）带头一再要求武装起来，参加新加坡保卫战。英当局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仍没有忘记对待殖民地人民的那些老框框和老套套，压制、压制、再压制。柔佛通新加坡岛的长堤自动炸断了，丝里打军港的防御设备自动炸毁了，贮油池自动放火焚烧了，总之，准备放弃新加坡了。只有在这时候，才开始发一千枝十九世纪的旧枪给三千名星华抗日义勇军，把他们送到最前线当炮灰。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勇敢的突击队，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有店员、工人、舞女、学

生等。每人拿了四毛钱的“起身费”，斗志昂扬地开往最前线去了。我们青训班有不少学员如罗骚等当了义勇军的政训人员，写作人陈如旧从青训班指导员变为流星队指导员；但是令人沮丧的消息一再传到抗敌总会和战时工作团来。我们在晋江会馆（抗敌动员总会总部）听取前线回来的青训班成员的汇报时，郁达夫大队长急切地问：

“英军究竟发给你们什么样的武装？”

“不知从哪里搬出来的旧枪。打打鸟还可以，打日本可不灵！”穿着蓝色制服，头上盘着黄色布，右臂上缠着一块三角的红布的青训班学员（现在是义勇军的政训人员）高声回答。没有钢盔，没有军帽，没有英澳军那样的全副武装，倒像农民游击队员。

“我们强烈抗议：干嘛发这样的武器？义勇军司令官、团长英国人打里上校回答：‘这里没有现代武器，等到新的运到再换吧。’大家知道，丝里打军港把大批新式弹药填海了！”另一个学员差点没骂出声来。

“我们要求和英澳军一律平等的待遇，英总司令说：‘东方人和西方人生活水平不一样，平等待遇办不到。’我们志在抗日杀敌，渴望替祖国开辟海外战线，保护侨胞的生命财产，只好将就了。”一个排长叙述了他们和总司令交涉的经过。

这时，郁达夫细小的眼睛突然发出愤怒的光，额上青筋一条条浮起来，扯着嗓门说：

“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重演！”

他从切身经验看透了英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人民的真面目，强烈的正义感和正直的性格使他控制不住心头的怒火。

在所谓“新加坡防御战”的前夕，一次，我和郁达夫一起进防空壕，他近乎自言自语地说：“战争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了。”然后问我：“我仅仅是一个作家吗？”

我兴奋地回答：

“您还是一个战士，达夫先生。”

关于这句话的插曲发生在三年前。

插曲表现了郁达夫的另一侧面。

郁达夫在星洲三年多，主编《星洲日报》的《晨星》等三个文艺副刊，一度代理《星洲日报》主笔，写了许多抗日救国的文章，其中引人注目的有：《抗战两年来的军事》、《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抗日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今后的世界战局》等，以《敌我之间》为题的《致新居格氏》尤为脍炙人口。新居格氏是日本文艺批评家，由东京《读卖新闻》社转来一封他致郁达夫的公开信，表示“愿两国间的不幸能早日除去”。郁达夫站在民族立场答复道：“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心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不同。和平是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但他们觉得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郁达夫相信，“我们总还有握手欢谈的一天”，行文得体，把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此外，郁达夫在扶掖马华文学青年方面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然而郁达夫主编《晨星》开头第一炮却打得并不漂亮。1939年1月21日，即到达新加坡的第四星期，郁达夫在《晨星》发表了题为《几个问题》的杂感文，谈的都是南洋文艺青年所关心的、热烈讨论过的问题：这就是学习鲁迅风问题，南洋文艺的创立问题，新

启蒙运动问题，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以及利用旧形式的问题，郁达夫在原则上肯定了问题的重要性和提法，而立论的轻率和给青年泼冷水的态度，却使大多数读者感到意外。郁达夫对于“学习鲁迅风”这样提：“对这问题，我以为可以不必这样的用全副精神来对付，因为这不过是一个文体和作风的问题。假如参加讨论的几十位先生，个个都是鲁迅，那试问这个问题，会不会发生？再试问参加讨论者中间，连一个鲁迅也不会再生，则讨论了，终于有何益处？”又说：“持这一种态度的问题提出者和讨论参加者，我们只有对他表示敬意，即使那问题是一愚问。我们只有惊叹着他‘其愚不可及’而不能施以谩骂和轻薄。”华侨青年尊敬鲁迅，要求学习鲁迅的杂文体，学习导师那种反托派、反汉奸、反洋场恶少、反颓废分子的战斗精神，而郁达夫一笔抹煞，指为“愚问”而且“其愚不可及”，“不必这样用全副精神来对付”，读者的失望是很自然的。关于南洋文艺的创立，郁达夫的论点更为大胆：“南洋若能产生一位大作家出来，以南洋为中心的作品，一时能好好写它十部百部，则南洋文艺，有南洋地方性的文艺，自然会得成立。”这么一说，马华(马来亚华侨简称)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和文艺讨论都是多余的了，只要等待“产生一位大作家”，南洋文艺就“成立了”。郁达夫也赞成新启蒙运动，但是认为“首先还应大家来选出若干部书，开一个书目出来，教育青年去读。”按那时马华青年读书风气很盛，读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抗战文艺作品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一再翻印，读者们很担心郁达夫又要搬过来施蛰存的庄子那一套。况且把新启蒙运动和“教育青年去读”等同起来，未免太狭隘了。

反应的强烈可以想见，青年作家和广大读者在我主编的《狮

声》上纷纷发表商榷的文章。我在《编者附言》中写道：“郁达夫先生是中国文艺界的老前辈，他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如《沉沦》、《迷羊》虽然充满了肉的颓废的气息，却也反映了当时另一部分不健全的苦闷青年的倾向，在文学史上占着相当地位。抗战要求每一个文化人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因此，即使是以颓废文人著称的郁达夫先生，我们也希望他能本其热情与正义感，动员他的笔和口，为民族服务，这便是郁达夫先生到新加坡来虽然声称是‘慕南洋风光’，而南国文化青年们仍不减其热诚希冀的原因。不过郁达夫先生开场第一炮，便使我们失望。”（南洋商报《狮声》1939年1月24日）

郁达夫从抗战正酣的汉口，而福州、而杭州，到香港乘船于1938年12月28日抵达新加坡。抵星不到一个月，没有调查研究，没有与马华青年广泛接触，没有摸清文化界的脉搏，只听了槟城个别的人的反映，便贸然发言了。文化界强烈的反响，使他失去了冷静的头脑，他在《我对你们还是失望》一文中说：“楚琨先生：承蒙你们不弃，把我当做一个讨论目标；天天座谈之余，写些‘颓废’、‘迴避’、‘默认’、‘历史装饰’的话来表明态度。…有一点须注意的，就是‘文艺’不是‘武艺’，‘讨论’不是‘抗战’。我自信正因为有了‘过去的历史’，与鲁迅、郭沫若、史沫特莱、鹿地亘、或周恩来、吴玉章等的交情，所以觉得用不着五窍生烟。”（《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1月27日）

我的答复有这么几句：“《狮声》这次检讨郁先生的大作，完全是为了爱护真理，毫无恶意杂在里头。我们对那些无耻的文化人和托匪之流固然不惜‘迎头痛击’，而对尚不失正义感的郁先生则雅不欲如此，也不应该如此！”（《南洋商报》《狮声》

1939年1月28日)

论争的第二星期，郁达夫在一篇答辩文章中追述在上海时曾对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说过：“I am not a fighter, but only a writer(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反应更大了。《狮声》的投稿者和《狮声》编者认为无论在革命年代或抗战时期，作家都应该是战士。抗日统一战线争取团结一切爱国作家，可以等待。

论争是这样结束的：《晨星》出了一个专号，文章很不严肃。《编者启事》说：“这一回，因为楚琨先生在《狮声》上赐教的结果，收到的第三者们来稿极多。……这一种文字愈积愈多了，不得已，就只能选出几篇来登载一下。”（《晨星》1939年2月7日）

《狮声》编者唱了收场白：“昨天《晨星》出了一个漫骂与攻击的专号，目标是《狮声》及编者个人，全版充满吹、捧、骂、意气，把‘乞丐儿、浪人、伪君子、小人’之类的骂语都扯上。……我愿再诚恳地正告郁达夫先生：我们要讨论问题，就得抓紧主题，采取严肃而诚恳的态度……万万不能把精力浪费在无原则的意气之争。”（《狮声》1939年2月8日）

论争结束的第二个月，3月5日香港出版的《大风》旬刊第三十期，发表了郁达夫的绝唱《毁家诗纪》。当时王映霞和他住在一起。我们对他家庭的悲剧深表同情，同时又为他国难当头，自扬家丑感到惋惜。

在新加坡积极备战的1941年，郁达夫又由一位李小姐的推荐，在英政府公共联络部兼了一个职务——《华侨周报》主编。我们再次为之惋惜：为什么一个赫赫有名的文学家要在英政府当雇员？